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重在治权”理念指引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以正确政绩观 校准科创方向感

■陈思 方露阳

在高质量发展坐标系中，科技创新既是关键引擎，也是检验政绩观的硬场景。

一是以真实需求校准目标。比如，能力是否实现可持续沉淀。大量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并非因为缺少学术产出，而是因为中试环节薄弱、工程团队不足、质量体系缺位、场景与供应链适配不够。能够补齐这些环节的投入，往往比一次性亮点更能决定长期竞争力。

又如，韧性是否得到系统性增强。科技创新，既要跑得快，也要跑得稳。韧性不是保守，而是把短期优势转化为长期优势的前提，体现在关键环节可控性、关键能力可替代性以及系统抗冲击能力提升上。

二是以创新规律校准节奏。比如，原创探索阶段的不确定性最高，产出往往呈跳跃式。如果过度追求确定性与可验收，容易把探索压成任务、把科学问题改写为指标问题，更深层的代价是削弱真正的原创空间。此时更应关注方向是否前沿、问题是否关键、团队是否稳定、平台是否开放，并为必要试错预留制度空间。

又如，工程化放大阶段往往决定成果能否跨越从原型到产品的关键门槛。不少成果止步于此，并非技术本身不成立，而是中试能力、工程队伍、质量体系、供应链适配与跨部门协同不足。此时最稀缺的是组织能力，而不是口号式提速。把工程化能力补齐，才能把技术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产业。

三是以评价牵引校准导向。比如，更重效能而非数量。投入和数量可以描述力度，却不能替代结果。新时代新征程，更应关注关键问题是否解决、关键效率是否提升、关键能力是否补齐、关键风险是否可控。

又如，更重可复用能力而非个别亮点。平台、体系、装置建成只是开始，持续运行、持续开放、持续产出才构成真正成绩。中试供给的稳定性、工程人才的体系化、场景对接的连续性、政策服务的可预期性以及标准与治理的系统化程度，决定创新能否从一次性成果走向持续产出。

归根结底，目标对准真实需求，节奏遵循创新规律，评价强调持续成效。以正确政绩观校准科技创新方向感，才能在争分夺秒中守住方向、在加速演进中不失定力，才能把行动导向有效方向、资源导向真实效能、短期成绩导向长期能力。

（作者分别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特约研究员）

■李俊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制度对于治权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体现了管党治党的新思路新战略，指明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新路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对健全制度规矩提出明确要求，将制度治权的要求贯穿始终。

第一，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指明遵循规矩创造政绩的新路。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源于对长期执政所面临的危险和考验的清醒认识，是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更好运用公共权力这个关键环节的系统回答，也是对党员干部遵循规矩、遵守规矩创造业绩的明确指引。

“重在治权”体现对历史周期率的系统性回答。延安“窑洞之问”中，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周期率“精神懈怠”层面问题作出制度性回答，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困扰思想层面的答案引向人民当家作主、对权力监督这个本质问题，实现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制度性超越，也是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践行和拓展。

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长期执政的难题和问题，在对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研究进行系统构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执政党如何保证权力为民所用、党员干部如何保持初心使命，是对制度优势的本质性回应。

“重在治权”是体现长期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新举措。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不仅要在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还要在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具有规范性和规律性，才能更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坚持，不仅在于民主、科学、依法执政，还在于党员干部用好手中权



自我革命重在治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管理，而是从自我革命层面提出的全方位、更自觉、更严格的要求。治权的实质是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推动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从推进党的事业、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视野看，肩负强国使命的执政党，不仅需要依靠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保障权力运行的正当性、正确性，还要以有效驾驭权力、科学配置资源，保证政绩创造的科学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重在治权”体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新思想新要求。自我革命重在治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管理，而是从自我革命层面提出的全方位、更自觉、更严格的要求。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视野看，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内在地要求把权力运行这个重大问题从始至终进行科学布局、有效管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无论是在党内权力运行，还是党员干部的公共权力运行等方面，都要加强引导规范。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鲜明特点和突出贡献。也要看到，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必

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必然要求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实绩。

第二，以治权的科学经验和基本规范，指引政绩的正确方向。

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不仅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制度建设在管党治党中的重要作用，还从具体层面上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依靠制度管人管事提供科学指引。治权的实质是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推动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出问题，表现为权力乱用滥用或者权力不用弃用，其深层次原因是权力运行中约束不严、监督不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以清晰的制度导向，推动领导干部遵循规律、遵守规矩，把权力行使引向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创造政绩。

坚持权责法定原则，创造政绩的前提是知责、明责。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公共性、创造政绩的人民性，客观上要求从源头上牢固树立规则意识、规矩意识。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要求，严格遵循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上级报告、请示，及时和班子成员沟通，使得决策有据、行为有方。

制度建设还需根据随时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将好经验好做法总结上升为制度。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应深入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订，确保制度的及时和有效执行。

规范权力运行，推动党员干部在规则、制度约束范围内干事创业。权力的天然属性决定，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就可能被滥用。权力的授受关系，即权力的党性和人民性，决定权力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造

福。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原则。

规范权力的重点对象、重要事项已有明确的规定。规范权力的成效在于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应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和轨迹，及时发现错误政绩观背后的责任问题、作风问题、腐败问题，深化以案促改促治。

加强权力监督，及时发现政绩观偏差问题。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实现对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以党内监督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特别是，要用好干部考核这根指挥棒，完善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完善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同时，注重监督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等行为。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纳入巡视巡察、干部考察、审计整改监督的重要内容，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

有效行使权力，坚持权责对等、权责一致。严格落实追问责机制，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对于在改革创新中出现失误的，统筹做好追问责和容错纠错工作，消除“洗碗多，打碗也多”的顾虑，保护好党员干部的开拓勇气、创新精神。

对于心态“佛系”、状态“躺平”、工作“摆烂”、光说不练的，指引方向给动力、监督问责给压力。对诬告行为及时治理，对失实检举控告及时澄清，树立为干事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的鲜明导向，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第三，健全党内政治文化，培育正确政绩观内化机制。

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的生动实践，需要坚持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的宝贵经验，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政治文化，为制度治权、务实创业提供良好的组织支撑和文化氛围。

坚持民主集中制，厚植真抓实干的组织氛围。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既是党员干部的组织生活、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也是公职人员正确履职的基本要求。

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党性分析重要内容，用好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宗旨意识、工作作风、纪律规矩等方面深入查摆剖析。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其成员通过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反映等途径，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

健全党内政治文化，涵养和巩固正确政绩观。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影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为支撑，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旗帜鲜明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同时，加强党性修养，大力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让“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成为普遍追求。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要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警示教育作用，尤其要深刻剖析错误政绩观的思想行为变化、变异的轨迹，从中发现规律性认识，探索及时教育、适时提醒和纠正的有效机制。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构建工商管理自主知识体系

■林嵘 吴晓隽

一段时间里，中国工商管理学的主流范式、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大多源自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管理理论。这一“知识借入”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阐释力和引领力。构建工商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对既有管理理论的修补和“本土化包装”，而要立足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真正实现从知识引进到知识创造、从经验概括到理论建构、从学术跟随到主体表达的跨越。

一是服务时代，在时代变局中重塑问题意识。

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根本上来自对时代核心问题的捕捉与回应能力。当前，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交织演进，正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组织的边界、资源配置的逻辑和竞争优势的来源。

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崛起使企业与市场的传统二元结构趋于模糊，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改写组织决策的权责边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重构要求企业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工商管理学面对的不再是相对稳定环境下单个企业内部的经营优化问题，而是技术变革、组织重构、产业升级与制度环境相互激荡下的复杂系统性命题。经典管理理论预设的产权清晰、边界稳定、竞争充分等情境，正遭受挑战乃至突破。

构建工商管理自主知识体系，一个首要任务是实现问题来源的根本转变——从引入和验证既有理论转向从中国企业、中国产业、中国市场的鲜活场域中自主发现问题、自主提炼概念、自主建构解释框架。其中，供应链重构中的韧性设计与战略自主、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能力重塑与价值分配等命题的背后，都涉及现有理论难以充分覆盖的新机制和新逻辑，是工商管理自主知识创造的真实入口。

从学科内部看，工商管理学长期以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方向分工，二

级学科方向分别在组织战略与运营、价值衡量与治理、服务消费与场景创新、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等领域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基础。面向新阶段，这些方向都面临功能拓展和边界重构的现实压力。

比如，会计学的研究重心正从传统财务核算与合规报告延伸至数据资产确认、ESG信息治理与企业战略控制，核心命题从“如何衡量价值”转向“如何治理价值创造过程”；企业管理的核心关切正从稳定环境下的战略分析、组织设计转向复杂动态环境中的平台协同、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持续重构；旅游管理面对的研究场景则早已从传统服务运营延伸至消费升级、文旅旅展融合。数字场景创新，城市服务体验和在地文化价值的激活构成新的理论生长点；技术经济及管理愈加深入地介入科技成果转化、创新项目治理与产业链协同升级，成为工商管理学与科技创新战略最直接的知识接口。

可以说，服务时代要求工商管理学完成一次问题体系的自我更新，不再满足于解释既有管理现象，而是真正进入中国企业转型、产业演进和组织变革的现实场域，在时代变局中锻造自主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自主知识体系持续生长的现实根基。

二是服务科技，在交叉融合中拓展知识边界。

科技创新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的突破，还是组织方式、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的系统性重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转化，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创新生态构建，从“四链融合”的政策设计到企业层面的创新治理落地，每一个环节都涉及深层次的管理机制问题。

在这一进程中，工商管理学并非辅助性角色，恰恰相反——如何组织大规模协同创新，如何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的激励结构，如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创新资源的战略配置，正是工商管理学能够作出原创贡献的核心命题，也是其知识边界最具活力的

生长地带。

真正意义上的交叉融合，不是在管理学课程体系中嵌入若干技术模块，不是把工程问题翻译成管理语言加以描述，而是在科技创新的真实场景中发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现象，进而提炼新概念、建构新机制。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组织嵌入为例：当人工智能系统深度介入企业决策流程，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如何重构？组织权威的来源与边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类问题，既不能由技术科学单独回答，也无法由既有管理理论直接覆盖，需要在交叉地带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从学科方向看，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的核心使命正从评估技术项目的经济效益向研究创新组织的制度设计、演化机制深化；企业管理需要更系统地进入专精特新企业成长、链主企业的产业链协同治理以及技术范式转变条件下的战略重构等场景；会计学在科创企业估值、创新投入绩效测度和数据资源确认方面面临有准确框架的内生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旅游管理则可从智慧文旅、沉浸式体验与平台运营切入，探索数字治理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的新治理逻辑。各方向有真正进入科技创新的现实场域，而非停留于外部观察，才能在交叉融合中实现知识边界的实质性拓展。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面对技术变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制度情境，单一的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日益显现局限性。系统工程与复杂科学方法论的引入，为研究平台生态、产业链协同等复杂系统问题提供新的分析工具；智能制造与信息科学的交叉，为组织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理论建模开辟新空间；神经科学与数据科学的融合，则将消费者决策的神经机制、管理者认知偏差与人机协作中的信任形成过程纳入可观测、可量化的分析框架，从根本上夯实管理学的微观行为基础。

将跨学科方法与传统管理研究范

式有机整合，构建“智能+”背景下的工商管理学方法论体系，是新一轮学科前沿竞争的核心赛道之一。这一交叉融合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增量价值，也正催生既理解技术底层逻辑又具备战略判断和组织协调能力的新复合型管理人才。知识范式的主动升级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步重构，是工商管理学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完整路径。

三是服务中国，在实践中孕育新理论、新概念、新范式。

构建工商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归根到底要回答一个问题：原创贡献究竟从哪里生长出来？答案只能是：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企业成长逻辑、产业演进路径和组织治理实践中生长出来。中国经验不是既有理论的注脚，也不应成为等待套用西方框架加以解释的“案例库”，而是孕育新理论、新概念、新范式的原生土壤。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管理实践上积累了一批具有高度理论原创价值却尚未得到充分学术提炼的现实现象。其中有三类议题，因其鲜明的中国情境特征与方法论创新需求的高度契合，尤为值得重视。

第一，超大规模数字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机制。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场景最为多元的数字消费群体。西方主流消费者行为理论建立在“理性选择”的个体预设之上，难以充分解释中国消费者在直播电商、社交裂变和沉浸式场景中的真实决策逻辑和消费行为机制。

第二，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变革推进与员工认知重构。近年来，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政策引领与市场驱动协同推进、覆盖广度与推进速度双重领先的鲜明特征。转型进程中，组织能力重塑、代际数字融合与层级协同创新等课题相互交织，构成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中国管理情境。现有组织变革理论，无论是强调阶段推进的变革管理框架，还是关注员工参与的变革领导力模型，大多形成于西方渐进式市场化背景，对“系统性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员工认知重构的心理机制与行为响应路径”缺乏充

分的理论解释。

第三，平台生态治理与产业链协同的中国机制。中国头部平台企业的生态扩张逻辑、链主企业在产业链协同中的带动机制，既不同于美国平台的自由市场演化路径，也超越西方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边界。这一议题的复杂性在于：平台与产业链的交互演化涉及多层次、多主体的动态协调，传统的线性因果分析框架难以胜任。系统工程与复杂网络方法的引入，为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治理模式开辟路径。

梳理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到从知识追随迈向知识创造、从经验概括走向理论建构、从学术跟随走向主体表达的复杂性在于：平台与产业链的问题——通过理工人文交叉融合持续开辟新的理论生长空间；服务中国，解决的是理论主体性的问题——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概念与机制，以自己的问题框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三者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的：有了真实的问题意识，才有拓展边界的方向；有了拓展边界的方法，才有建构理论的能力；有了理论建构的自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还必须经得起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与对话。中国管理学的目标，不只是解释中国、服务中国，持续提升自主知识供给能力，还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向世界贡献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范式。

（作者分别为东华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落实“双碳”部署

■张毅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新发展阶段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部署。

第一，加强科技创新，激活绿色发展动力。

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大对清洁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等研发投入，深化新质生产力。

加速绿色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建立健全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夯实绿色产业基础。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

培育壮大绿色新兴产业，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构建绿色智能产业集群，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循环利用。

第三，加强公众参与，让绿色低碳成风化俗。

公众参与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加大绿色低碳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消费理念，从需求侧引导企业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生产生活，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成风化俗。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的背景下，要抓住绿色贸易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制定、完善国际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推动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同时，深化绿色技术合作，加速全球绿色技术创新步伐，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增强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